



理论文库

“创新型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社会公平”——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俄]弗·米赫耶夫 文 刘敏茹 编译

2008-08-15

【内容摘要】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一系列思想和重要决议，即巩固中国向市场民主主义发展的方向，更加积极地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正如中国人喜欢总结的那样——使中国变为一个世界眼中的“正常国家”。当然这一切都要按照“中国式道路”进行。

【关键词】十七大报告；经济；民主；社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一系列思想和重要决议，即巩固中国向市场民主主义发展的方向，更加积极地致力于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正如中国人喜欢总结的那样——使中国变为一个世界眼中的“正常国家”。当然这一切都要按照“中国式道路”进行。

十七大巩固了胡锦涛、温家宝政治组合的权力地位，实质上使过去几年中主政的“胡温新政”为中国社会带来的革新开端，在党的高层中得到巩固和延续。

“创新”一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反复提及并得以确认，中共实质性的创新在于：

——进行政治改革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

——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仅依靠扩大数量来建立“创新型经济”；

——实行“稳定但不平等”的社会政策，以便能够达到公平地分配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弱化社会矛盾的目的；

——增强中国作为构建国际新安全和全球共同发展过程中的“负责任的参与者”的国际角色。

大会上通过的一系列思想上组织上的决议，为继续实施“新政”奠定了政治基础，而且表明中共对中国式共产主义传统价值观的忠诚。

大会在意识形态上仍然保留了中国共产党所特有的理论两面性，以此来维护党内稳定，对在业已形成的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基础支持和反对意见的人们之间维持政治平衡。一方面，大会强调要忠诚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忠诚于毛泽东、邓小平以及江泽民“三个代表”的思想。这些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的思想重申了中国四代领导人（毛—邓—江—胡）之间的继承性。另一方面，胡锦涛在党章中加入了自己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理论，其实质是始终坚持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的社会经济进程，强调科技因素的增长，借鉴过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验等等。大会上宣读的“科学发展理论”的文本，使那些希望在其中看到令人欣喜的创新的“进步读者”注意到“摒弃旧有方式”、“坚持求新”等一些口号；也让持偏保守观点的人看到了中共坚定不移地遵循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要求。

在组织建设上，胡锦涛尽力为中国最高政权引入了更多的年轻政治家，他们将在下一届党的大会上成为新的“第五代”中国领导人。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提出的思想和组织上的举措，本身并不能保证中共进行成功的战略革新，何况其中还存在一些固有的矛盾。但是，与过去的五年相比，更有利于实现“胡温新政”的大环境将会形成。

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具体方向和轮廓的形成与干部调整一同成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成果。当然，大会的既定目标只是朝着民主化变革的方向继续前进，而并没有突破中共现行政权的框架。但是，如果看不到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如何进行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那就错了。

最近三四年，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在经济改革之后推进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在1989年学潮之后被“遗忘了的”邓小平关于在市场经济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主张此时再次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尽管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政治改革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只是在内部严格的政治控制下对问题进行“隐秘的”讨论。然而，对该问题的讨论历来都是完全严肃和极为谨慎的。

中共十七大强化了政治与经济的如下关系：随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的源泉与其说是“伟大的社会主义”，不如说是“更加民主化”。

十七大召开之前的几年中，中国的政党研究精英们积极地讨论了几种未来政治改革的方案。其中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模式进行中国化的改革，还有（在统一台湾之后）向二战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并存的两党制回归。当然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显得更为空洞和抽象。

实际上，中共看重的并且在十七大上强调的另有其事：

——发展党内民主，而不是全民民主；

——在乡镇领导人选举层面上发展“基层民主”；

——加强法治，为民主奠定法律基础。

在这次大会上，还通过了政治改革的另一项内容——培养负责任的选民。

十七大在推进政治改革进程中更注重方法，使民众习惯于用选举程序来表达自身的诉求。虽然这些程序只是党内组织和基层民主层面，但这说明中国领导者在尽力避免消极的负面“意外”和“民主主义的休克”。此时，中国的大多数人仍然是贫穷和未受过教育的，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可能会投票选举那些激进主义或平民主义的力量。

当然，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中国民主之路的效果如何。但是，在这个60%的居民是未受过教育的贫穷农民所组成的国家中，政治改革方针的设想是，先建立起民主的法律基础，培养大多数人习惯于通过选举程序来表达自身的需求，再转变为全民民主。否则将会有政治“休克疗法”导致的混乱危险，而混乱将再次催生出独裁。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 [1]。

中国的政治体系以市场为基础，这使其“社会主义民主”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非常接近。但这两者有两点本质区别：第一，在政治上，中共因垄断政权而缺少二选一的选举。第二，在社会经济范围内，尽管中国近些年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但是，政府依然没有做好准备来承担社会支出的重担，也没能为大多数居民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

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社会发展首先以经济为基础，而且中共准备进行自我更新。而原苏联共产党则自我发展乏力，不能克服苏联行政命令经济的体制性危机，笔者认为，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崩溃的基本原因之一。与之相对，中国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稳定增长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保证了中共政权在中国民众心目中的合法性。

当然，中共领导人并不接受将其政治新元素同西方的民主标准进行直观比较的做法。可见，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接近于被称为“主权民主”的原则，这种思想认为“我们不需要关于如何发展民主的表面化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前夕，政治学家们对俄罗斯所谓的“主权民主”领域的“研究著述”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中共也逐渐意识到朝民主化方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政治民主化的实际内容则取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变化。

市场化改革进程本身引起了中共对政治改革的兴趣。随着国内经济增长，中国出现了中产阶级，形成了资本家阶层，中国社会因为互联网而变得更加开放。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和中国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给上千万中国知识分子打开了“朝向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建议有了新的不受中共掌控的来源，经济和人文诉求需要有新的表达形式。这要求中共必须客观如实地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当前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国内政治的稳定。发展以法制为基础的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使其能够“担当起”“政治稳定器”的功能。

这种变化在大会上并没有得到说明，但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总体了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中国领导人并不能拒绝未来国家政治体制的两种可能，或向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模式转变，或退回到旧的两党制体制，尽管这是遥远未来的前景。

中共用以下几点来维护自己政治改革的逻辑。

第一，中共认为自身在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和推进政治改革方面的潜力巨大。

第二，中共认为在中国搞民主“休克疗法”可能会导致选民“不负责任的”选举，最终导致政治混乱。

第三，现在掌握中国政权的商业政治集团不愿把政权交给“非党人士”、侨民或是政见不同的人。

第四，中共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先例中看到，“党权”体制的瞬间瓦解不可能立即带来新的“法治”的政治体制的确立。可见，渐进和间接地加强法治，实际上是共产党权力自然收缩的结果。

此时，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说，中国共产党落入了一个陷阱，即法的权力越大，党的权力就越小。但是中国共产党认为，这种风险至少在理论上（在现实当中，通常情况更为复杂）是可以化解的：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控着加强法权的过程，在宏观政治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上层建筑”中保持着自己的权力地位。

与以往党代会不同的是，中共十七大确立了一系列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针。

发展党内民主方面：

——实行“公开化”，中共中央政治局定期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汇报工作以及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地方党委全体会议汇报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工作的开放性。

——扩大党内讨论的实践。

——减少党对微观经济层面的干预。

——中共在地方党委、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及人民政协代表的选择上建立起自身的守法性。

这样既可以通过精简党和国家官僚机构来对其进行改革，又可以“建立服务型政府”。

基层民主方面：

——用发展党内民主来教育党员和非党居民民主选举的程序，以达到在“党组织领导”下发展“基层人民自治”机制的目的。

——引入地方代表大会换届和党代会的长效机制，其目的是在县、市以及县级地区进行试验。

——将上级党组织推荐基层党组织领导岗位候选人同普通党员及党外人士推荐结合起来。

加强法治方面：

——十七大特别注重从最高层做起，同党和政府各个层面出现的腐败活动进行斗争；

——通过使用法律来引入“公平”的概念，这意味着旨在从根本上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在教育“负责任的选民”方面，依靠“扩大党内民主”以及使非党人士熟悉党的事务等更好的方式，从制度上“推进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还不能在社会上建立一个从属于自己并保留着当今中国八大党派活动性质的反对党，而且中国依然存在着对网络和媒体的监督。但是，十七大也引入了一些被认为是“希望的”的社会阶层的自由主义思想元素。十七大上对所有社会成员使用了诸如“人权”、“新闻——文化自由”和“平等机会”这样的表示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概念。

中国共产党能否真正地进行自身改革，这将是评价十七大的政治改革水平和表彰其战略重要性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十七大在政治改革领域内提出了新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任务会自动完成。来自政治体系方面的阻碍以及官僚主义和执法活动的现实将干扰这一本来很有希望的开端。可见，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关键是以“现代思想”和“实际需要”为重点内容的发展观，而不是以“陈规旧矩”和“过时教条”为基础的。

政治改革以及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的推进对中国共产党来说都是十分严峻的挑战。无论中国社会改革是成功进行还是停滞不前，中国领导层内部都会出现对政治改革进程不满的人。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政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层领导的意愿和中国政权金字塔顶尖力量的对比关系。第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改革到底有多伟大，这个问题尚不明朗。然而，毕竟十七大的政治改革明确了中国领导人政治理念发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框架。

创新型经济

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的主要经济发展目标是到202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并建立一个“中等富裕的社会”，以及在2050年使中国变成“主要的世界市场”。为实现上述目标，最主要的方法是在中国建立“创新型经济”。其前提条件是：形成以企业为核心、以市场为定位、将生产单位、大学和研究机构整合在一起的国家创新体系；把创新凝聚于企业当中；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实现生产力；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深入研究“知识产权战略”，旨在快速增加中国的世界知名学者的数量。

笔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科技潜力不足以实现十七大所提出的建立“创新型经济”这一雄心勃勃的任务。重大科学方面的落后局面将在很长时间里阻碍中国成为全球创新强国。因为中国创新潜力的形成主要依靠的是借鉴国外经验，这使中国无法成为和美国相提并论的科技强国。尽管如此，十七大提出的“创新型经济”仍然被列为国家财政开支的中、长期的首要任务。

除此之外，中共十七大提出经济战略的首要工作还有：依靠农村城市化和壮大中产阶级把内需变成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注重提高“质量”；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依靠增加服务、农业比例以及缩小工业比例的办法克服结构比例失调的问题；保障能源、维护生态安全；通过提高“知识经济”产品的比重来发展出口；参加全球和地区一体化进程。

2004年，中国宪法的修改依法确定了公民私有财产“合法所得”不可侵犯的原则。问题在于，中国的国家资本需要的是对其所有者权利的保护措施及其政治利益的表现机制，而共产主义的思想和法律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基础——宪法，并没有保障新的所有者阶级的这种要求。与此同时，“维权”问题在当今变得越发尖锐，已成为比“利益实现机制”更实际的问题。后者只是正在形成，且结构体系较弱。对所有者权利的保护有利于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利益，因为它既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又使人民群众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权力的合法性。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技术治国派——正统派”或者“改革派——保守派”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矛盾都是不可信的。当今，中国共产党内除了影响力较小的左翼依然忠诚于“战时共产主义”的价值观外，没有任何力量反对市场改革以及与外部世界的一体化。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围绕在党的核心领导人周围的不同党内集团与维护核心领导人亲属经济利益的国家资本的代表们之间的冲突。中国高官的子女们积极参与电子、通讯、交通、能源、金融等领域的商务活动，或者与这些商业联系紧密。中国派别斗争的特点是，这种斗争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范围内进行，并且遵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时代所形成的规则、传统、程序以及行政格局。

2006—2007年中国经济动态的评价是，中国并没有在中期成功地给经济增长速度“刹车”和防止经济“过热”。由于农村城市化的原因，来自于人数日益增加的中产阶级（1.5亿人，其中5000万属于“高级中产阶级”）的要求将继续引发中央所无法控制的对投资需求的增长。

笔者预测2008—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10%—12%（2007年为11.5%）。对基础建设的投资增长速度保持在24%—25%。刺激进口的手段对于降低贸易平衡表中的利润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在提高（与2005年相比，2007年年中上升了7.5%），中国

的出口速度依然很高，2007年的顺差（约为2500亿美元）与2006年相比增加了40%。人民币坚挺的趋势将会持续，中共十七大与十八大之间的五年间，人民币对美元的比率有望达到5—5.5：1的水平。而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却伴随着它相对于其他世界货币（比如，欧元）的稳定和巩固。由于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以及出口产品价值的增加，中国很可能在未来出现出口速度减慢的情况。

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势必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第一，出现多变性——会定期反冲，但对中国市场（不动产和证券）来说，会出现较高速的上涨态势。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是“轻度危机”，这与2007年初发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情况类似。然而，中国社会中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普遍信任以及在“现实经济”的基础上稳定的经济增长，经常会形成对有价值证券需求的增加。2007年，出现了居民银行存款的数量减少、并大量涌入证券市场 and 不动产市场的状况。

第二，消费需求的增加使价格形成领域内出现了新的态势。低通货膨胀的几年过后，根据2007年的趋势评价，在未来五年当中预计年消费价格的增长会达到3%—5%。在最大程度上，粮食价格的增长（7%—8%）将会加快通货膨胀率，非粮食商品价格的的增长通常在1%—1.5%。为了遏制通货膨胀央行不得不频繁提高贷款利率。

第三，对于不久以前还很贫穷的中国社会来说，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中国的消费者对于吃饭和看病的事情已经不再抱着以前那种无所谓的态度了。对高品质食品和服务的需求急剧增加，引起高质量食品和服务价格的飞速增长。

社会公平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社会公平”的概念。这一概念的范畴从形式上看理应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组成部分。这个并非全新的问题的实质是：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失衡，它威胁社会稳定，并进而威胁政治稳定，甚至威胁到中共的权力。因此，十七大强调必须“公平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努力防止滋生“破坏稳定的不公平”。这一社会政策思想是指，尽管中国公民不能同时富起来，但是首先人人应当获得平等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其次，必然存在的社会不公平不能成为社会政治稳定的威胁。

在本世纪前十年中期，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激化了一些早先被掩盖在“贫穷的公平”下的深层社会问题，社会分层加剧，民众中出现潜在的不满情绪，住房、教育和医疗费用昂贵使得百姓无力支付。中国政府在2006年至2007年对社会经济政策进行了重大修改，使形势总体上缓和下来。尽管在中国没有类似于俄罗斯的“国民计划”，但是处理社会优先问题的变化将会在行政财政支持下实现，同俄罗斯的“国民计划”相比这是中国式的革新。

2007年3月16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立的社会政策的首要基本任务是确定了以下目标：给予人民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鉴于高效的经济增长方案中经济模式的转变并没有带来就业的增长，采取积极就业政策；逐步降低不同社会居民群体间的收入差距；建立覆盖全体中国居民的乡村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些政策目标实际上重点在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2006年，开始实施取消农业税和农业所得税的法律。计划依法保证最大多数城市和农村的困难群体最低生活保障。福利保障政策主要针对农村的贫困者。2007年社会规划的预算在农村发展、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和解决失业问题上的支持投入都比上一年度大幅增长。

在农业领域内，中国解决的社会问题还仅处于“低水平”。1958年建立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将国民划分为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致使居民在获得教育、医疗、住房和就业上的不平等加剧。同时还引发了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他们拥有农村户口，因此他们不能享有医疗服务，也不能把孩子送进学校。中国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不把农民束缚在农村，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农村的快速城市化（与中产阶级的成长一同）是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内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

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问题。中国领导层尽力最低限度保证人口的零增长，当然，他们更愿意这个数字能缩减。中国人口政策的主要矛盾在于，一方面人口增长得到控制，另一方面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居民老龄化问题将在2030年成为中国养老体系产生危机的根源。但目前主要目标还是有利于控制出生率的。

社会上更多的不满情绪是由住房、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新的不平衡”引起的。

中国的住房政策，是1998年中国国务院专门制定的，其内容包括了解决住房问题的三个层次，即贫困家庭享有廉租住房；中等收入和低于中等收入的家庭可以购买住房，享受国家补助；富人应当从市场上购买住房。但是，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这项政策已经失败了。贫困和中等收入的家庭实际上得不到购买补助性住房应享有的补贴。补助性住房事实上还是很贵并且流入了商业领域，补贴也甚至在实际当中落入到富有的购买者手中。

2007年3月，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完善供贫困阶层居民租住的廉价住宅的建筑体系，称为“社会住房”。这一方案的实施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建筑企业从中无利可图。为了筹集“社会住房”的建筑资金，国家调用了向商业建筑企业收取的土地租金。中央政府命令地方政府拿出5%的土地租金款用于建设社会廉租住房。但是，地方权力抵制政府的决定，他们担心，廉租房的出现会降低不动产价格，最终导致地方权力从土地出让租金中获得的收入减少。

随着居民富裕程度的增加和社会信息开放度的扩大，接受优质而低价的教育问题在中国日益尖锐。城市和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差距日益扩大。文盲（主要在农村）数量同互联网使用者（城市居民）的数量相同——1.3亿。中国同龄学生受教育覆盖率在全世界居第108位。2007年，尽管国家的教育投入增长，但是总的趋势是市民自己的支出在总的教育支出中所占比例扩大，高等教育投入不断增长。居民很难给孩子找到好学校。在中国，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之间进行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问题与前景的争论从未停息过。双方意见相左。一派主张必须“停止照搬西方的教育领域商业化模式”，以防止加剧社会中的不公平感。另一派则主张为了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不能降低，而且要提高教育收费，在高等教育中要严格按照美国的体系，引入竞争机制，停止国家监控。后者得到城市教育界的支持。

2007年，国家对教育政策做了一些修正，旨在增加中央和省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补贴。但是，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依然将限制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发挥正面影响，并且意味着国家社会政策的更大压力。

医疗卫生体系需要深化改革。2005年，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话说，中国领导人承认“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彻底失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举步维艰”、“耗费巨大”。吸引私有商业的加入没有给居民带来好处，因为他们的服务是针对富人的。医疗卫生体系的缺陷首先使农民成为受害者。尽管从2005年起就引入了新型合作医疗服务体系，但是它只覆盖到20%的农村居民。2006年至2007年，对医疗卫生政策进行了修改，旨在寻找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新阶段医疗卫生改革的表面目标是建立“国家主导的医疗卫生市场体系”，允许私人的、国外的和国家的医疗机构协调共存。预计在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完成之后，人们将可以自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医疗保险：各层次居民将享受到不同价格的各种医疗服务。由此社会公平得到保障，因为医疗卫生体系将根据收入水平覆盖所有居民，而享受最低保障的居民能够得到国家的补助。最终将于2010年在国家资助下建立起全国医疗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未来五年中国的基本发展方向。当然，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有多少新事物能够冲破固有的思想陈规以及政党和官僚政治的规制。

一旦中国领导层设定的新的发展矢量能够实行，至少对俄罗斯有如下两方面的战略意义。

第一，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政治改革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经济和政治中综合实力的增强，即便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垄断政权之下，中国仍将与“西方”越来越近。这一趋势对俄罗斯形成战略威胁：中国可能比俄罗斯更接近西方，这在未来将对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产生长期的消极影响。

第二，中国资本、中国跨国企业和中国品牌在世界市场的扩张在短期内已经并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对俄罗斯的全球竞争力构成挑战（也类似于对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挑战）。世界经济中，新兴的强大“竞争伙伴”将出现在俄罗斯面前。

为应对这些挑战，俄罗斯需要做的是：首先，更加积极地进行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其次，使俄罗斯外交适应中国在全球走强这一事实带来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俄罗斯不仅要在中俄双边关系、上海合作组织范围内的多边关系、朝鲜问题六方会谈以及“俄—中—印”“三角区”等领域着重改变自己应对北京的新的全球定位策略，而且要在“俄—美—中”及“俄—中—日”关系中间接地建构针对全球问题的新的政治框架。其三，有必要深入研究如何在全球大变革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同时，应当准备就建立新的国际安全与合作体系同美国、欧盟，更要同（北京常说的）“正在崛起的”中国进行对话。

如果与中国相比，俄罗斯离西方“更远”，这对于俄罗斯或许将意味着失去作为后社会主义的市场民主主义大国的某些竞争优势。

资料来源：В. Михеев: Инновацио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глобальна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о и экономика, 2007, 9—10.

[1]笔者在这里说明：“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两个概念对社会理解的描述是有区别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以

“瑞典社会主义模式”为代表的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体系，包括对自由完全的肯定和市场民主主义思想的观点；“社会主义民主”则主要是苏联时期公认的思想和反民主实践。

（来源：《国外书刊信息》2008年第7期）（作者弗·米赫耶夫是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译者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上一条 中国特色的民主
下一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再思考

[网络链接](#) | [联系我们](#)

版权所有：中央编译局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斜街36号 邮编：100032

设计制作：文献信息部信息技术处